



天价粽子被谁吃了?

又到端午,自中秋变成“中国送礼节”之后,屈原也未能幸免于浊水之中,市场上出现了粽子与月饼高价齐飞的局面。据报道,某地天价粽子销售人员称购买1880元粽子礼盒的客户,都是送领导、送客户的。订购粽子礼盒的主要是机关、保险公司、银行等单位,主要是买来送礼。

那么这礼往何处去呢?天价粽子又该落谁人腹呢?笔者斗胆猜测最终享食了市场上高价粽

子的无非三种人群,其一是某些领导干部,食品毕竟不是现金和银行卡,乃是有保质期的,于是本着不想浪费粮食的精神狼吞虎咽;其二是某些机关人员,手握采购权,自订自销,为帮大家改善伙食,反正不在账面上只会反映为礼品;其三是某些当权人员,很多公司每逢节假日总是少不了要打点一圈的,自然看碟下菜,权重位高的送1880元的粽子,经手办事的送880元的粽子,能少不能免。

由此,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天价商品走红的规律。应季应节可以堂而皇之送礼的商品会走红,容易赚面走账的商品好走红,对方易收且不会被查和监管的商品最走红。东西下肚,任你纪委来查几个几百回合,也只剩剩便了,拿什么做证据?且收入几个粽子,几盒月饼,几只大闸蟹,往浅了说不过是邻里的厨房剩菜社交,难以上纲上线。

所以近些年来我们的消费

品,特别是节日消费品市场出现了一个高低端倒挂的怪现象。做高端的越来越多,高端商品越买越贵,买高端的人越来越多。与此相对的是,做低端市场的商家逐渐减少,低端商品受原材料上涨之困却涨价困难,而买低端的人也表示愈发买不起,买点苇叶糯米回家自个包粽子去了。

而这种状况绝不是好事。便宜的群众买不起,昂贵的有人抢着要,现实也赤裸裸地反映

出国内两极分化程度不断拉大的问题。商家自然是逐利而居的,当暴发户的钱比大众的辛苦钱更好赚时,他们自然会调转头去开发奢侈品,笔者认识的某位做粽子生意的商人去年就改行去炒法国红酒了。所以我们现在的市场状况就是,底层商品由于质量问题和涨价逐渐沦陷,正如只知别墅和大户型的房地产市场必然畸形一样,这种畸形发展的市场也为经济埋下了隐患。

□王亚煌



问题酱油“吃进肚里”就了事?



都吃进肚里了,咋个召回?

6月12日,佛山通报了7个使用问题半成品酱油生产的酱油企业。涉事的广东开平市长沙亿华达调味品厂负责人称,“成品酱油召回不回来了,都被消费者吃进肚子里了”。明知是问题酱油,相关企业却以“被消费者吃进肚里”为由拒绝召回,这一说法,显然是逃避责任的托词。

□邵俊国



请记住“的哥老王”的命运

近日,媒体曝光广州出租车司机老王,因举报行业潜规则而丢了工作,之后老王为进入广州市委客管处反映情况,从围墙上跳下来,摔断了右大腿,至今未愈,伤情经鉴定为九级工伤。

老王在广州白云机场北停车场乞讨糊口。

一个正常的社会,从来不需要什么英雄,人人尽己之责,膜拜就不会成为退缩的借口。从这个意义上说,“老王因何而举报”不重要,重要的是“老王举报

了什么”。老王举报的真相,早已被证实。如果说企业有一千个理由开除不能任劳任怨的出租车老王,那么,权力者当有一千零一个理由捍卫公民维权的义举。这是一个奇怪的社会生态链:不举报,老王的生活可以一如从前,“茶水费”这个公开的秘密也不会溅起一丝涟漪;一举报,出头的椽子先烂了,“茶水费”事件也不过点到即止。既然老王的举报事实上增益了公共利益,那

么,同样以公共利益为归的公权,为何不能在老王与“茶水费”的博弈中助前者一臂之力?二者,广州“茶水费”是大是小,是“一个人的偶发”还是“一群人的寻租”?这些问题,即便不能全听老王怎么说,起码可以多听听哥的姐怎么说。

有一点是肯定的,打击举报者就是鼓励犯罪。与其说我们是关注老王的命运,不如说是关注公正秩序中是否有失衡。

□邓海建



让收入增长跟上“工资指导线”

据报道,截至6月19日,目前全国已有10个省份发布了2012年的企业工资指导线。其工资增长基准线大多在14%左右,其中新疆和天津基准线最高,达16%,北京基准线最低,为11.5%。

去年,各地出台的企业工资指导线,也大多在14%左右。各地出台的工资指导线并不具有强制效用,仅仅为市场提供参考,尤其是在集体工资谈判的时候,可以有所凭依。

尽管工资指导线不可能直接带来实际工资的增长,但以往的经验表明,二者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对应关系。比如,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平均工资主要

数据显示,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42452元,同比名义增长14.3%,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8.5%;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24556元,同比名义增长18.3%,实际增长12.3%。

因此,职工平均工资适度上涨应该可以预期,不过,考虑到税收等因素,居民到手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能有多大,还值得期待。

应该看到,当下经济形势比

较复杂,要想让居民收入跑赢CPI,跑赢GDP,增幅达到两位数,恐怕要面临更多的困难。很多民众对此信心不足。

近日,央行公布的2012年第二季度货币问卷调查报告显示,居民未来收入信心指数为53.2%,较上季下降1.7个百分点,是1999年有调查以来同期值中的最低水平。

无独有偶,国家统计局公布的5月份经济数据显示,该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715亿元,

同比名义增长13.8%,增速创下近一年来的新低。

居民对增收信心不足,导致消费增速下降,并非孤立的事件。眼看上半年即将结束,如何进一步增加居民收入,提振民众信心,还需要减税等实质性的政策出台。

另外,就是要通过改革打破垄断,缩小私营与非私营单位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1年城镇私营单位在岗职工的年平均工资

为42452元,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为24556元,前者是后者的1.73倍。这并不令人奇怪,大家不难发现,很多职工平均收入较高的企业多属垄断行业。

当下,直接将某些人的“蛋糕”分给别人或许并不容易,但是一些利润和回报率较高的行业,完全可以让更多的人来分享,让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共同做大“蛋糕”。

年中将至,近期或将有很多利于民营经济发展、利于收入分配改革的政策发布,期待这些政策能够激发民间投资的热情,让民众看到工资收入上涨的希望。

□经社

DUSHU

读书



余英时评冯友兰:犹在“功利境界”

余英时先生在与学者刘梦溪的一次谈话中说,他对冯友兰先生晚年写的《三松堂自述》一书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原准备想写文章。但是后来当他在美国夏威夷举行的朱子国际学术会议上与冯友兰及其女儿宗璞见过一面后,他说,尽管他对冯友兰有看法,但却不便再写文章公开批评了。看到这则材料,当时我就很想知道余英时先生对冯友兰究竟有怎样的看法和评价?新近出版的《余英时访谈录》一书终于将这一直底揭开。

1982年夏天,美国夏威夷东西方中心举行了一个为期长达十天以上的“朱嘉国际会议”,冯友兰先生作为大陆代表团成员应邀参加。在为期十天的会议中,余英时先生经常有机会与冯友兰接触并聊天,原因是当时来自大陆的其他与会学人大多不太愿意与冯友兰接近,且唯恐避之不及。

在此间,余英时还促成了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冯友兰荣誉博士学位一事。具体经过是,在另外一个会议上,余英时对哥伦比亚大学的狄伯瑞教授偶然谈起,作为冯友兰先生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似乎可以考虑赠予冯友兰先生一个名誉博士学位。毕竟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不料,狄伯瑞教授认真考虑了这个提议。很快哥伦比亚大学便作出决定。决定在1982年的9月授予冯友兰先生荣誉博士学位。余英时先生应邀参加了授予仪式。晚宴时余英时又坐在冯友兰身边,二人交谈甚多。正是因为这些近距离的接触、交谈,余英时先生对冯友兰才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并进而形成了自己的

看法和评价。

余英时先生认为,冯友兰思想的最深处始终有一种向“帝王”进言的意识。这只要读一读他的《新学记》(中)《应帝王》一章即可知。余英时讲,冯友兰不敢以柏拉图的“哲学王”自任,他的中国背景使他只想做“王者师”,或者至少要做政治领袖的高级顾问之类。纵观冯



余英时先生在书房

友兰的一生,我们不得不承认余英时的这一评价是大体公允的。从早期的献媚蒋介石,到40年代出席国民党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从“土改”的粉饰太平,到“批林批孔”的摇旗呐喊;从迎合“总裁”,到歌頌主席,乃至媚国女皇,冯友兰一生不脱“应帝王”情结。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一书中对冯友兰有这样一段

评价:“冯友兰对当权者的政治一向紧跟高举,像他《新学记》的最后一篇《应帝王》等,都是给蒋介石捧场的。在我们看来,一个学者这样做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有害身份。”同样,邹承鲁院士在一次访谈中回答记者“西南联大的先生里您最欣赏谁,最不欣赏谁”时,坦言自己“最佩服的是陈寅恪,最不

还是出于“对自己的尊重”。

“零首付”可遏制出版恶性竞价。在资深出版人李德明看来,无论出于何目的,“零首付”的兴起,本身就说明一些作家很自信。然而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除了少数几位,不少名家一时还很难接受“零首付”。毕竟有个可观的“保底数”,也不至于让自己的写作太吃亏。

于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一些已经过气的大牌作家,明知自己作品的销量已大不如前,但仍乐得以自己所剩的一点名气,去换一笔高昂的首付款。而出版社虽然出书折了本,但也乐得用作家的名气来给自己贴金。

正因为现在一些名家将首

付款看得很重(有时甚至是恶性竞价),这也就造成了出版社的恶性竞价。

据记者所知,现在稍有点名气的作家或者写手只要一有新作的风声放出,家门口便总有排队来换钱的书商。这些书商手里都提着箱子,里面都是预付款(现在书商喜欢付现钞)。

有一个畅销书作家门口发

生了这样一幕:两个书商相遇了,一位见一位拎的箱子比自己大,赶紧回去换了一个大的,当然也装更多钱了。对此,麦家看得很清楚:“恶性竞价和竞价的结果是什么?出版风险增大,为了减小风险,书商有时不免做出无德之事。”

□郦亮

欣赏的是冯友兰。”

时至今日,为什么世人冯友兰一直是多有异议呢?余英时先生认为,这和冯友兰提倡的哲学有密切关系。冯友兰在《新原人》中把人生分为四种境界,由下而上依次是:一、自然境界,二、功利境界,三、道德境界,四、天地境界。冯友兰自己是以“天地境界”自许的。西南联大时期,冯友兰路遇金岳霖,金氏开玩笑道:“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冯答曰:“到天地境界了。”遂相顾大笑而去。可惜冯友兰所谓“天地境界”云云,终不过是虚言诌语耳。正是因此,余英时先生才说,冯友兰以“天地境界”自许,但50年代以后他的实际表现似乎在“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之间。非但如此,他所有的所作所为都是向帝王进言的潜意识中作祟,不过境界确实未超出“功利”之上而已。

□史飞翔

《中国当代乡土小说大系》首发式暨乡土文学创作研讨会12日下午在北京鲁迅文学馆举行。与会作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乡土小说应是当代文学中最为辉煌的部分。

作为农业大国,中国具有长达数千年的乡土文化,乡村的发展与变化成为中国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杆,因而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之一。对此,中国小说学会常务副会长雷达表示,时代变迁为文学带来了重大的冲击,但即使这样,乡土文学依旧不会绝迹。他说:“无论现代化和高科技如何发展,乡土文学的诗意以及对人心理的滋养都是不容忽视的。”

雷达指出,对于中国来说,乡土文学的话题永不过时。而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乡土文学还有很多资源可以继续挖掘。“要知道我们的文化根源在哪里、如何清醒地看待中国农民,以及中国文明在世界的地位。所以对我们来说,乡土文学并不过时,是需要温故而知新的。”

著名评论家孟繁华则认为,在当代中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乡村文明开始出现崩溃。“乡村更多的是留守老人和儿童,土地不产出一粒粮食和一寸纤维,乡村文明没有了载体。”

不过,在孟繁华看来,这并不意味着乡村小说题材的终结,反而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乡村文明的终结不等于乡村小说题材的终结。乡村文明的崩溃,使作家们开始书写新的乡土文学,城乡交界处的题材得以显现出来,从而为乡土文学提供了更外一个版本。”

而对于孟繁华的这番言论,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常务副会长叶梅却显得“乐观”了许多。她说,中国的乡村文明根深蒂固,尽管时代变迁,但大多数的乡村文化却没有因此而发生改变,“甚至上个世纪没有根本的变化。”

叶梅告诉记者,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从农业化向工业化转变的过程,而总人口约80%的乡村人口的命运也因此发生改变,而这种变迁无疑为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高科技尽管超越了人类的想象,但乡土文明却依旧根深蒂固。”

乡土小说是当代文学最辉煌部分

文军长篇游记《欧洲行》出版

中国美协陕西壁画艺委会委员、咸阳市美协名誉主席、咸阳市工人文化宫研究馆员文军,继出版《文军画集》之后,又将第三次应邀赴澳大利亚、意大利、土耳其与外国画家合作壁画,进行文化交流的所见所闻,撰写成近30万字的长篇游记《欧洲行》,日前,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

该书历时两年多完成,收录了作者63篇旅欧游记,文笔酣畅,余味无穷,装帧精美,图文并茂,足不出户,就可饱览欧洲的历史文化和风土民情。

□张翟西滨